

性 / 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专号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 此「败德」非彼「败德」： 校园性骚扰与（同性恋）情欲标记

Jose Neil Cabaro Garcia 原著  
金宜蓁、涂懿美合译，何春蕤校订

从上学期（1994年春季）开始，菲律宾大学已然成为一所性解放的机构：因为它在本地学术单位中第一个容许开设有关男同性恋文化的课程。这个破天荒的决定所带来的媒体效应清楚的向大众宣告，尽管就在一年前还澎湃着宗教立场的性基本教义派——最近还在刚刚闭幕的埃及开罗「人口及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兴起一阵辩论的热潮——然而这所最重要的国立大学还是决定秉持它维护学术自由的传统，容许开授这门课。毕竟，正如这所大学现任校长最近在《亚洲周刊》(Asiaweek)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言，大学的责任就是研究人类的状况，正因如此，它决不能忽视同性恋，因为同性恋也是一个「自然现象」<sup>1</sup>。

---

<sup>1</sup> Asiaweek, "Controversies: Out of the Closet" (5 October 1994): 33.

菲律宾大学现任校长 Dr. Emil Javier 说同性情欲「是一种自然现象」，可见他真的是一个活在诺亚时代大洪水之后的人，也证明了他的思想远远超越许多他同时代的学者及政府官员。我相信 Dr. Javier 身为一个农业学家，一定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动物界有着许多所谓的「同性情欲」（事实上，动物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物种群中都有某些同性性行为）。

虽然自然／不自然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压迫的基础，使得许多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在过去

我写这篇论文是为了要以文本来记录某种被迫害恐慌的狂想，以免有朝一日局势变化而令我完全想不起发生过的事情。毕竟，开拓空间让性发声，有其潜在的危险。换句话说，创立一门课的同时也就埋下了颠覆它的可能，这其中的力量通常要不是大于至少也是等于原先发声时所需要的力量。

就这个例子来说，任何肯定同性恋的尝试都会翻转异性／同性的二元对立，而这个二元的对立也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其他生活领域中的翻转，特别因为另外有些社会力总是会紧紧的与原有二元对立中那个占优势的名词接缝，因而也会跟着形成翻转。在去除异性恋自恃「自然」的特权时——追溯异性恋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过程也必然同时会破坏异性恋看似无须中介的自我认同——同性恋研究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可能要甘冒招致反控的风险，而反控的力量就来自那些因着自然优越的异性恋情欲神话而得利的社会机构：教会、家庭、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本身。因此，针对任何理性讨论情欲议题的努力发出的剧烈抵抗，极可能就是来自这些主流的、管理情欲的社会机构的连结。

当然，我之所以会特别尖锐的感受到这种被迫害恐慌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门该死的课就是我开的！还有，我也必须承认，当这门「争议」的学术课程引发公众压力时，我的表现并不优雅：在媒体攻击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的体重减轻了（那其实蛮好的），我承受了失眠之

---

一个世纪吃了不少苦头（对本质论者来说，还不只一个世纪），但是单单承认同性恋「是自然的」，并不能解决同性恋者的难题。事实上，当今世上有许多东西即使被大家承认是自然的，还是会继续受到摧残：蟑螂会被踩、大海中浮满了垃圾、婴儿（根本还没展现性取向）和垃圾一起被丢掉、而地球本身虽然就是自然，也照样被破坏了。

此外，这个自然／不自然的争论根本没什么重要性（甚至是荒谬的），因为要讨论「自然」是什么，其参照点甚至根本就不是人类（或是排除人类的）。最早提出这个教条的早期基督教领袖认为同性性交是不自然的，因为连动物都不会有同性性行为（而今我们知道他们要不是说谎，就是观察力太不敏锐了！）就算我们照这个（非）理性的逻辑推演下去，那我也可以说，既然自然的定义是由动物所决定，而自然又是好的、不该违反的，因此所有人类就应该做动物做的事：我们该坚守「自然的动物性」，随意大小便、不要待在室内、发情时就到处交配，而且绝对不可以表现出我们有「意识」的迹象（也就是说，我们要阻止文明的产生）。

苦，我愈来愈不参加家族聚会，我也愈来愈注意自己的外表以及别人如何窥视（我觉得不只是注视）我等等。现在事后想起来，这也应该没什么稀奇的：既然情欲是我们共有的「肮脏小秘密」，那么任何想要用谨慎缜密的学术研究来让情欲具有可见度的努力都难保研究者自身不被影射在内。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说，一旦公开我是那门同性恋课程的教师，我就需要衔接起我在公共空间以及私人生活中倒底是谁（或是「什么」）的差距。过去新批评(New Criticism)理论对「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的教条信念通常会容许作者维持公私身分之间的某种距离，然而现在，就像美国黑人作家 James Baldwin 以及其他西方同性恋作家都无法将他们笔下以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和他们生活中的个人完全划分开来一样，我实在没有其他选择，我必须拥抱这个课程所代表的涵义。我必须「现身」。

事实上，我想要现身！我自己在想：要是研究者不肯把自己座落在同性恋文化的脉络中，她又怎么能开始研究同性恋文化呢？在同性恋这个研究领域里当然应该有同性恋者自我再现的声音，然而此刻这个声音却很明显是缺席的。要是研究者都无法拥有她个人发言位置的真确性，那么谁会相信她的研究呢？更重要的是，你会相信自己的研究吗？在这个讲求政治正确的时刻，特别是在碰到情欲问题时，支持这种互信的「客观性」很不幸的已经不存在了。傅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十九、二十世纪交会之际，各种形式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l)论述的兴起，使得「性」成为现代「我们生存的真貌」<sup>2</sup>。性被当作一个公开否认、私下耳语的秘密——被当作一个不能宣告的知识，好像一宣告就会宣泄在灵魂最深处洞穴中呻吟的回响似的。

傅柯对现代西方情欲的系谱学诠释当然不能直接地套用到菲律宾；然而，我们菲律宾本地的医学、宗教、学术、以及通俗情欲等等论述的持续西化，恐怕也已经造成了某些类似当年产生生命政治而且使得「性」

---

<sup>2</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Part 4.

在欧美文明中占据象征中心地位的条件。但是，大体上来说，菲律宾的情况非常不同于西方，特别是菲律宾社会中某些阶级的人根本就还没有能力对性以及情欲达到任何一点点技术性的（也就是说自我反省的）意识。这个情况也就是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提过的、菲律宾特有的、对任何和性相关的事情的「语言检查」：简单地说，本地所有描述生殖器官和情欲活动的语词，听在文雅的耳朵中都是「令人震惊」的。一到了要谈性这个主题的时候，特别是要用本国语来谈的时候，似乎就没有了在「语型」(register)上能被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所认知的世俗／宗教二分。不过，我们应该要知道，这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情色恐惧(erotophobia)其实和语言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情色恐惧并不是内建在菲律宾的方言里的——事实上，这种对性的偏见很大部分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才被移植到我们文化里的。（在另一方面，早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菲律宾南部族群的伊斯兰化也已经把情色恐惧带入了群岛地区。）

同样的，我们若要说整个菲律宾社会都有情色恐惧倒也不符合实情。事实上，在大幅海报流行之前，早就有许多非常受欢迎的所谓「淫猥」小报和影剧迷友杂志正当化了性事的讨论。这个现象似乎证实了宗教保守派人士的猜疑，也就是说，在菲律宾都会文化中的确已经有一些把性当成平万事物的社经场域(sites)——就好似我们的历史在过去一百年中曾经和西方一样经历了人类的性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等等实证钻研似的。当然，本地的通俗口味也在这样的平凡性质上加了一些特别的色彩：当今八卦小报上提供的性幻想大多流于庸俗或怪异，某天有个朋友对我说，现在某些八卦小报已经开始尝试描述「味觉诱惑」(gustatory seduction)了。这类故事显然仿自美国的商业（好莱坞）八卦，然而在将国外的「内容」，功能性地挪用到本土「形式」中的时候，这些故事也会挪用菲律宾传统料理中的事物。我的朋友就提起他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是以本地很受欢迎的传统菜肉酸汤 *sinigang* 作为重要剧情元素，而大家很容易就注意到 *sinigang* 绝非优格(yoghurt)或鱼子酱这种外来物。在由西方带动的性化过程中，我们和西方之间在叙事形式的装备上可能

不尽相同，但是对「口服之欲—性器之欲」这个基本主题的偏好恐怕是一致的。

在这样一个状况中，这个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对学术圈整体以及特别是对菲律宾大学有何影响，都同时使我兴奋也使我害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这个世代（年轻的这一辈——我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的菲律宾都会人口，在情欲方面有着上一代所没有的体验；由于爱滋议题、全球人口问题、妇女运动的动员，在大众传播媒体上或在学术圈内，情欲的讨论已经到达一个很自觉的发声程度。而我开授同性恋研究课程这件事也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中才有其意义。这个学期（1994年春季）在两星期前就已经结束了，但直到上个星期，我都还在评估开课这件事，因为后来又有另外一些论述被编进了这个 / 我的文本。在《亚洲周刊》刊出菲律宾大学同性恋文化研究课程的那个星期（我对此有一些复杂的情绪），菲律宾大学有一位资深教授被控非法拥有枪械，不只如此，这位名叫 Salvador “Bading” Carlos 的哲学教授还被三个 13 至 16 岁不等（之前的报导是说 14 至 17 岁）的女子控以强暴。这三个女人——严格说来，应该称为「女孩」——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被 Quezon 市警察以游荡罪名逮捕，她们被捕时向警方陈述她们在那个邪恶(*salbahe*)的男人手中所遭遇的一切<sup>3</sup>。

媒体拿这件事情大作文章，而事先毫无所知的菲律宾大学行政部门大感惊慌，立刻召开记者会，上至校长，下至最低层的幕僚，都严肃而愤怒地对 Bading Carlos 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的指责。Diliman 校区的校长办公室有鉴于非法持有枪械以及他们内部调查视为「重大行为不检」的罪名十分严重，因此预判他停职 90 天作为防范；校内的女性主

<sup>3</sup> 1994年10月8日的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有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详细报导，是由 Doreen Jose 所执笔的。直到现在（距事件发生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我还没有看过有哪一篇关于 Bading Carlos 的后续报导能超越或取代这一篇原始的报导。这个事件中关于特异变态叙述的权威报导，在刚开始——虽然不见得是概念上的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

Jose 还在继续追踪这件事，她最新的报导对那三个女孩的年龄提出了修正，并告诉读者这件案子的最新动态。参阅：Doreen Jose, “Colleagues bail out UP professor,”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6 October 1994): 1.

义者则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公布女性研究中心早先所做的调查：在受访对象中有 82.35% 的人表示或多或少承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sup>4</sup>。由于这份调查把性骚扰的定义留给填写问卷的人自行决定，结果举凡令人厌恶的注视、碰触、到开玩笑都被包括在内（我会在下文中处理这种定义上的宽松所带来的问题）。由于我是菲律宾大学的教员之一，单单这个原因就已经使我被包含在上述事件所创造的以及后续的悲伤及歇斯底里中；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使我和一般的菲律宾大学教师有所不同：当我对这个丑闻的细节愈来愈清楚时，我也愈来愈有受迫害的妄想，甚至开始感到上个学期我的同性恋研究课程在学术圈的性版图上可能造成的「差异」正在时断时续地在我脑中内爆，并且好像阴谋似的停留在那儿，就像月光随时要幻化为最锋利的刀锋一样。

这种妄想故事的开端可以说是这样的：菲律宾大学准许我开同性恋研究课程，这显示校方已经能够接受同性恋教师的现身，也能让同性恋教师向学生讲授同性恋文学以及其他同性恋议题。然而，Bading Carlos 事件发生了，他被三个未成年女孩控以强暴，她们说他开枪顶着她们，逼她们做各式各样「奇怪」的事，她们甚至声称 Carlos 在她们身上（内）

---

<sup>4</sup> 这个恶名昭彰的研究是由菲律宾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 Rosalinda Ofreneo 所做的，研究对象为 204 位师生。虽然校内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个研究还不算很完整，但是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就在群众心中引起了某种狂想。我最关心的是 Bading Carlos 事件首日上报几天后，媒体报导这份研究时所忽略的一句话：

「有被性骚扰经验者，七成五是女性」。

这句话没有提供我们推测的是，在菲律宾大学校园中有二成五的性骚扰「受害者」——推理而知——必然是男性。这项研究因此虽然触及了男同性恋的情欲关系，但却又避而不谈。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从同性恋的角度去阅读 Ofreneo 的研究及 Carlos 事件所形成的「怪异文本」，免得这个妖魔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再度将这个越轨的再现给同性恋化了。

参阅：Doreen Jose, "Sexual harassment rampant in UP Diliman, says survey,"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1 October 1994): 1.

此种妖魔化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警察已经很努力但没有能够在 Carlos 家后院找到尸体，Carlos 最近也指控菲律宾大学里的女性主义者都是没有吸引力但是心中很不满的女人和女同性恋。在这个媒体渲染炒作的报导中，西方大众文化的回响和阴影（例如连续杀手 Jeffery Dahmer）相距不远。

[参阅："Lesbian Mentors Harassing Coeds in UP," *People's Tonight* (17 October 1994): 1.]

使用假阳具／橡胶阴茎、拍摄裸照、还要求她们用色情的称呼来叫他。

就饥渴阅读这个故事的大众想像而言，**Bading Carlos** 并不是一般的性侵犯者：他有太强的性欲，他是性变态。虽然他被捕下监的罪名与一般的校园性骚扰无关，然而对他乖张、壮观的情欲生活被大肆的文本化揭露，却也唤回了他传奇式的过去的亡魂鬼影（它们不在少数）。在过去整整 20 年中，大学里广泛被谈论但从未得到证实的「半学术」传说把他描绘成一个非常曲折的情欲史诗里的孤独英雄，我 1991 年到菲律宾大学教书时很快就听说了他「当掉还是上床」(kuwatro kuwato) 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很讶异，在马尼拉有很多男同性恋都喜欢自称为 **Bading**（现在想来，至今仍有许多男同性恋自称为 **Bading**），而这么一个好色的异性恋男人竟然有着那么一个不太合适的外号「**Bading**」（本文中译为「败德」），这不是很讽刺吗？不过，这一回我听到这个倒楣的同名讽刺时，我感觉的比较不是惊讶而是担忧，也就是说，我觉得受挫。

我的被迫害妄想可能可以继续这么说：由于校方容许开设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又明显的包容 **Carlos** 这样的教授持续教学，大众很容易就会做出结论，认为菲律宾大学在性方面是很开明的，因为这所大学支持各种变态，让它们在校内繁衍，进而使学校沦为变态的殖民地。这种双重的觉悟所造成的冲击，有一种使人麻木的宁静效果：第一，很多人早已经知道这个「事实」，因此此刻再说，也可能只有修辞的效用而已；第二点，我作为**同性恋／情欲学术化**的先驱身分，在菲律宾大学这个正在发展的「性变态戏院」里有其角色作用。

关于第一点，无论 **Carlos** 有没有罪，面对这个愈来愈复杂的议题，我们都必须毫不含糊的说清楚一件事：同性恋与性骚扰（甚至强暴）并不是互通互包的范畴，它们根本是两码事。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只是人的性取向而已，就它本身来说，同性恋完全无关乎目前大家谈这件事时常常提到的关键议题：同意（或不同意）、滥用对方的信任、卖淫、或剥削。事实上，严格来说，上述这些恶行比较常发生在父女乱伦以及各种男对女的强暴中，而这些案例都很明显是异性恋的脉络，有着异性

恋的性质。在 Carlos 被控诉的所有罪行上，他或许是有罪的，而在某个程度上讲，大众也已经在心里判定他有罪了（但是最新的报导指出，确实的强暴控诉根本就尚未被提出）；他甚至有可能也犯下了传说在这最近一次「事件」之前所有曾经发生过的性骚扰案例，而据某些内线人士说，这些案例都是此刻的大学行政单位无法掩盖下去的。不过，这些都和异性恋无关，就像它们也和同性恋完全无关一样：虽然 Carlos 的情欲模式主要是异性恋的，但是他的滥用教师职权或者他的违反法令强暴那三个女孩（如果真有其事），都不应该被视为反映了所有的异性恋都如此，或者所有的教师都如此，甚至连明理的女性主义者也必须同意，这并不反映所有男人（作为划一的性别族群）都如此。

说了以上这些之后，我本来应该觉得很安慰：我个人这种（译注：即同性恋）*bading*（败德）和那种出名的——如果谣言属实也就是恶心的——异性恋 *bading*（败德）全然不同。但是即使说了这些（我必须承认这样讲事实上会引发另一些狂想以致于干犯另一些不义），围绕着「*bading*」（败德）这个突然含意丰富并且爱恨交织的语词的各种再现却似乎别有深意，彷彿在预告着什么不祥之事。

拥有情欲一直都是只有同性恋才会被诟病的事情。事实上，性史研究中最讳莫能懂的事情之一就是，异性恋运作的方式常常好像根本就不是情欲似的，因此性史研究也一直无法全面涵盖。在现代阶段，异性恋通常化身为无害、无性的面貌出现，例如「家庭」、「驯化」、「传承」、「人口」，当然还有那个最伟大的名词「爱情」<sup>5</sup>。另一方面，同性恋从上个世纪中叶在欧洲被建构出来以后，就一直担负着所有情欲的重担。事实上，在过去一百年中，人们对异性恋婚配伴侣的唯一要求就是她们的存在，公领域早就被假设为异性恋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需要再来谈这种最「自然」的欲望模式有什么优点或不可取之处。

傅柯指出，各种非中心的（怪异的）、完全被隐藏却又私下越界的情欲、边缘愉悦、及各种各样的「变态」，在十九世纪晚期落入欧洲性

---

<sup>5</sup> Kosofsky Sedgwick, "Queer and Now," *Tendenc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4.

学为其赞助者——资本主义的教会及国家——新做的司法及实证研究中，而且后来也被划归在一个统一的标签之下：「同性恋」。当然，傅柯著名的说法就是，这样的情欲不是被性学研究过程所压抑的，而是在研究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同性恋者」被视为来自某种不自然的、发展不良的、自恋的生理状态及／或心理状态，而她的歇斯底里、梦、偏好的性交姿势、感觉、和持久性都需要被详尽的整理分类——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她情欲贯注的从体液排泄到心理发散都要被当作研究对象。这种无情的离散物化过程是为了要确保异性恋伴侣的纯净，以决断的对照定义同性恋赖以被划为特殊范畴的主要特质——过度的欲望。在最近的「科学」认定了同性恋、异性恋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之后，同性恋／异性恋倾向之间呈现着连续体状态——这是早期欧洲现代文化对肛交所做的假设——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当然，著名的金赛研究是最先对这种可议的、医疗化的人类情欲模型提出异议的）。不过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随着这个「事件」在菲律宾大学从未被检验的情欲身体区域中的恶化，相对于这个事件，以上的洞见也有了它们毫不妥协的含意。

因为，「Carlos 事件」的明显独特性就在于它彰显了过度的欲望。事件主角 **Bading Carlos** 的欲望模式严格说来不算是单纯的异性恋，他被指控的那些性罪行其实已经溢出了异性恋常模，而他的欲望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都和所谓的异性恋恰恰相反。例如：他没有配偶（他和妻子过去二十年都没有在一起）；不是一对一的（他一次有个性伴侣）；是跨代的（那些女孩子都可以当他女儿了！）；不是传教士体位也不是以生殖为目的（他用假阳具玩那些女孩）；他有窥淫－恋物癖（他还拍下她们的照片）；此外，**Carlos** 本人在一次报纸访谈中也承认他有一点性别认同的混淆，还有雌雄同体的倾向（他说他喜欢为平胸、像男孩的女人拍裸照）<sup>6</sup>。不论他的意图、目的是什么，由于这种情欲此刻对他的生命有着决定性的含意，因此目前在媒体报导文本中所呈现的情欲形象已经俨然就是

---

<sup>6</sup> Doreen Jose, “在狱中的菲律宾大学教授说「我不是合于常规的人。」”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9 October 1994): 1.

Bading Carlos 本人，而且它已经落点在异性恋情欲之外，到了特异的、边缘壮观的、（尤其是在菲律宾性化的早期阶段）目前尚未定名的领域中。在这个不定形的位置上，Carlos 的性——虽然不确定它的确实定位——绝对不在「正式异性恋」的范围之内。就这一点而言，我在这篇文章开头提出的被迫害幻想现在可以用来为 Carlos 性文本被丢进的「界外」位置提供一个暂时的描述：单单就发生的顺序来说——同性恋研究课程宣告菲律宾大学教授长久以来隐藏在大学衣柜中的性怪癖**现形**了——Carlos 似乎已经被换喻「转化」成同性恋者，而他名字中的 bading 在此脉络下很讽刺的变成了这个字最普遍而且最耸动的意义：（同性恋的）败德（*bading*）。

这并不是说 Bading Carlos 真的是同性恋。很明显的，没有任何信号显示这样一个自我认识存在在这个还在发展的叙事中。（相反的，最近他出现在电视上的雄性自傲和他在报纸访问中沈着的「反击」有关他是同性恋(*bading*)的谣言，都显示他的自我概念太骄傲也太施恩，不可能是男同性恋者。）我想说的是，对他心理形态特质的再现，或是那个被镶嵌在「大学教授堕落了」这个特别故事中的自我「形像」，绝对都使他有资格享受原本只属于——或者至少到现在都属于——同性恋者的妖魔化(demonization)。

更正确的说，这个共同的处境和任何有关情欲的论述在菲律宾学术圈的情欲恐惧情境里所产生的双重效应有关：创始同性恋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性研究」），也就是立刻构成一个知识领域并定义它的边界，而所有的报复和拒绝也都将沿着这个边界不断的窥视或刺探，终究形成破坏和僭越。由于（同性）情欲借着我上学期开设的同性恋研究课程主题而发声，因此很容易就可以为大众的想像指认并证实那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公开的秘密」：大学教职员中的确存在着同性恋。同样的，我那个课程内的某些内容也可能具体再现了同性恋者是什么样以及同性恋者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教授这个课程，最后证实了在我的研究中所拼贴

的最近三十年来有关菲律宾都会区同性恋文化的许多观念<sup>7</sup>，其中最相关的（至少现在）就是（1）人类的情欲在潜在上是无限而且流动的；单单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知道，（2）到处都可能同性恋。虽然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开辟一个开明的、比较学术的空间以讨论和本地同性恋文化相关的概念，但是社会中有些人还是会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进行这样的讨论感到不满，特别是在 **Carlos** 事件发生之后，被这些人愤怒以待的可能性就非常真实了。

我在这个研究中所致力特权以及我在这学期就这些特权所进行的教学，在这两者发声之同时也产生出一组同样有说服力而且对等的脱权 (*dispriviligings*)。这种脱权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把所有明显惹人厌的、主流想要放逐的文化现实加以同性恋化，把它们加到那些容易被压迫的、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少数民族群身上。（在我自己的研究和我上课时想到的许多灵感中得到至少两个清楚的洞见：菲律宾的男同性恋者总是被想像成娘娘腔的男性 (*bakla*)，而且仅仅因为如此，不管在实际上或是象征层次上，男同性恋的议题都被少数化。）这些惹人厌的社会现实包括例如犯罪和「性偏差」在内，而正如 **Carlos** 这个案件在被大众媒体吞没的报导中逐渐清晰可见的，犯罪和性偏差两者都牵涉在内。

当然，概念上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欲望既是无可简化的多样，要找出一个应该适用于每个人的单一情欲准则可能不容易，然而 **Bading Carlos** 事件里最糟糕的部份不在于这个角色自身的性「变态」部份，而在于他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或自愿。然而他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同意或自愿，因为这三个声称被强暴的女孩都尚未成年，在法律上根本无法表示同意。（也因此，任何在学院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也都因为老师和学生的不平等地位而无法谈所谓的同意或自愿。）即使同性恋与犯罪或「性偏差」很明显的是两回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大学内一位资深的、德

---

<sup>7</sup> J. Neil C. Garcia, "Philippine Gay Culture: the Last Thirty Years / History and the Early Gay Writer: Montano, Nardres, Perez," Unpublished MA the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94.

高望重的教授评论 Carlos 故事的变态部份时看到这个同性化化的过程：Dr. Francisco Nemenzo 为了要转移注意力离开校园异性恋阳刚人口群之间的权力斡旋——即使 Carlos 在谣言中是个性骚扰的常犯，许多年来包庇 Carlos 的却正是这个社群，也因此这个社群在此时应该也一样感受到所有的压力——然而 Nemenzo 巧妙的避开了这个议题，却拐弯抹角的提到更早一些时候前一个控诉某个（没有被指名的）男同性恋教授性骚扰的案例，这个案例当时之所以没有造成媒体的轰动是因为它被上一任行政人员很方便的掩盖了下去。<sup>8</sup>

Dr. Nemenzo 的说法暗示，校园中的男同性恋教师骚扰了男学生却侥幸的避开了责罚。但是他拒绝说出这位男同性恋教授的名字，也就等于全面指控菲律宾大学所有的男同性恋教师都会骚扰别人，或至少是潜在的性骚扰加害者。比起政治系教授 Juan Tapales 和哲学系教授 Bading Carlos 的案例来，Nemenzo 这种对一个可见而且易于被妖魔化的大学少数族群进行不具名迫害的效应更具杀伤力；因为，至少 Tapales 和 Carlos 这两位「性侵犯者」是有名有姓的——尽管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他们和 Dr. Nemenzo 所属的「团体」而言，这种点名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而且至少 Dr. Nemenzo 会希望牺牲学术社群中那个小小的、易于被攻击的部份，以证明并保护整个团体的清白。即便如此，正因为 Carlos 和 Tapales 被点名，所以他们所犯的「罪」不会扩及他人；而当 Dr. Nemenzo 对某位男同性恋教师的性骚扰指控没有同样的指定具体个人身分时，这个指控也就是将菲律宾大学过去、现在、以及任何时候所有的同性恋教授都包括在内了。

\*\*\*

我在这些事件中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简单：我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害怕！然而我也必须澄清，承认自己的恐惧并不等于毫不知耻的颂扬自己的被迫害妄想。就如同那被低估却又被过度关注的「变态

---

<sup>8</sup> Dr. Francisco Nemenzo 是菲律宾大学在 Visayas 校区的前任校长。他在 Carlos 事件发生的第二周于 *The Manila Times* 的访谈中做出这种恐同的言论。

连结」一词所指出的，在大众的想象中「同性恋」和「败德」这两种形式早已被当成同一个变态 (*bading=bading*)；同样的，Dr. Nemenzo 歇斯底里的恐惧同性恋并攻击同性恋，以掩藏存在于菲律宾大学阶层体制中的大男人气概和异性恋性歧视——这两个现象都显示，同性恋特质已经是在围绕着这个文本编织的、逐渐稀薄的影像和定义的公众网络中流通的符指 (*signifier*) 之一。Carlos 事件出其不意的在大学当局面前爆发的同一周，《亚洲周刊》上的文章已经使我那时才刚结束的争议性课程引起了注意——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我觉得这一连串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件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个人的身分认同显然陷入危机：我已经标示自己是同性恋者（也因此非常可能是性变态者），正如我开授同性恋文化课程就表明了我是个有过度欲望的人，而在目前现代化规范的认知里，这样的过度欲望是最深层、最根本、可以将我整个人都涵括在内的「真理」。我当然承认这种「标示」仍然是学院式的，我的例子特别是如此，也正因为是学院式的，所以相较于我自己每次读同性恋诗歌或出版同性恋文章时，刻意将同性恋标记描绘在我身体上，两者很不相同。后面这种标记虽然主要是很痛苦的亲密感，但是它多多少少还可以被包含在「艺术」的一般空泛标题之下，因此不像学院里出于政治动机而描绘的情欲那样「官方」或绝对。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大多数的艺术是幻想创造的产物，其特征就是**艺术巧妙** (*artifice*)、仿拟、和成规。对很多同性恋者来说，正是艺术——以及其众多迷思——为污名化提供了最好的逃脱之路。

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将永远被放在「同性恋教师」这个描述之下——或者至少直到我能够（或被准许）自己就位为止。这个语词表示一种政治和职业上的认同形式，就像第二层皮一样（*skin*，有些狭隘的人会说，**就像罪恶 sin 一样**）附着在人的身上，一旦被证实或被赋与某人，就不那么容易否认或甩掉，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透过自我表达的或被迫承认的情欲状态而有效的**变成**他所陈述的那样。每当一个出名或自认同性恋的教师开始站在讲台前，接触学生的生活而且也被学生接触时，这个教师就已经在公开宣告，他的私密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他对课

中讨论文本的诠释之共鸣和重迭点、以及这些文本本身的轮廓之间，都有着对称的状态。他的每一个手势动作，每一个不确定的语调下降，都早已被他已知的「差异」本质所折射。在菲律宾，同性恋特质的身体辨识，是透过一个此文化特有的、互有共识的理解来进行的：阴柔的男性（或 *bakla*）就是同性恋者。事实上，在最近三、四十年的性化过程中，*bakla* 一直单独背负着男同性恋的包袱，而西方启发的同性恋权益以及性骚扰论述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过程。历经三十年对 *bakla* 的性实践和性倾向的关注，恐怕再也不可能把他们视为完全无性的生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菲律宾电影中出现第一批扮装角色时，却正是使用这个无性的表现手法）。

假如老师不再能「接触」学生——因为依照妇女研究中心的说法，那是一种性骚扰的形式——那么老师还是什么呢？我特别关心「接触」的议题，是因为一旦没有了这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个人交会和表达亲密的形式，我不觉得我能够有效的教学。「接触」就是分享痛苦和愉悦的秘密源头，既开玩笑也说实话，哼哼曲、唱唱歌、读读喜爱的诗句、分享狂喜、集体啜泣的时段、改变信仰、或诅咒他人——那是身体和心智的合流、热切的想要混淆真实、探索「安全」和琐碎平凡之外的东西、敞开那负荷着相同污名的心灵。不准许这类的「接触」练习，就是不允许在教室内发生真正的交会时刻，也就是将学习经验中的诗意和美丽驱逐出境。

要是因此再也无法以同样的好玩和溺爱，来欣赏学生热情的搬演一段诗句或一个故事，来面对那伸开手掌要求更多而且你也欣然愿意给予的脸孔，来直视那在一眨眼间显现友谊的学生眼神，要是都不能做这些事，那会怎样？难道教育一定要变成完全的无趣和疏离，老师才能传达并促进学习——只因为研究显示，在教学中的隔离和情感上的孤立是避免发生骚扰的唯一保证？难道老师为了实现伸出援手、作成连结、完成教学这些字眼最真实的意义时，就必须一次次的违反学术研究所提出的建议，甚至宁可危及自己的生命？现在看来，这些恐惧可能是事实，因

为连菲律宾大学校长本人最近也沾染了那一刻的歇斯底里而在电视上宣称，即使只是谣言，学校里的行政人员都会开始调查（委婉的说词是「查看」）校内任何教师疑似性骚扰的个案。在这里，我向校长提出的问题很简单：当被指控有性骚扰嫌疑的目标后来经证实只是谣言而无罪开释时，校长能不能保证这个人的生活不会因为这种折磨灵魂的控诉和反控过程，而四分五裂再也难以复原？

另外一些更宽广的问题相关于性骚扰议题在学院生活上所造成的效应：即便「有一些」教育工作者确实从事不法，然而是不是今后都必须从潜在害处的观点来思考教育，而不是从教育可能形成的好处来想？或者，依循傅柯对性压抑假设(repressive hypothesis)的讨论（他认为这个假设根本无法解释十九世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过去不存在的情欲被**生产和扩散**），我们也可以这样问：难道明细列举所有可能的性骚扰案例不也是在「生产／扩散」性骚扰？傅柯之所以揭穿性压抑假设，就是在说明情欲如果有任何客观实体，那也必须是在既存的知识体系之内被建构出来的。同样的，立法举证各种**不受欢迎**的情欲表现方式，事实上已经在表演中让它们成为存在。更实际的来看，为了让这个列举名单可以实际操作，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个计画的特定要点：例如，既然女性一向被**预设**为接受凝视而非拥有凝视的人，那么「不受欢迎的观看」这个罪行不就轻易的被划归给生理男性的教授（不管是同性恋或非同性恋）吗？

这些问题最后所推展出来最广也最重要的探究，和性欲望的划一性质有关：人们真的以完全一样的方式来体验情欲吗？问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是否每个人都在相等或相当的意义上拥有情欲？或者，不可能将个体之间代表原欲能量贯注的心理悸动加以量化？（精神分析认为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真的有可能想出一个情欲的定义而且自然推演出它的罪恶和过度，其中又以骚扰作为最邪恶的例子？

我的感觉是，这个探究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除非我们愿意对欲望（我们还得赶快加上）以及体现并享受欲望的多元人性——展开一场法西斯式的战争。当然，承认人类在情欲上的多元多样，绝对不表示所

有的情欲表现方式都有正当性。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性骚扰也是错的。但是它的错，不在于它是原欲的投注，而在于它确实是骚扰：当一个非常明显的权力关系横跨一切时，没有任何同意或自愿可能存在于双方中。学院中的性骚扰罪行被视为双重的邪恶，因为老师本来就是要解开真理和权力之间的神秘关系，因此老师也应该最关切有关这个关系的知识。老师的工作就是要追溯权力是如何在正当化的论述中发展其策略，以及「真理政权」如何促使这些策略运作以及如何被这些策略巩固，因此老师应该不至于糊涂到在自己的班级上滥用权力。

因此，创造一个有关性骚扰的论述——在学院中或学院外——就标记了知识和知识所促成的权力生产都要能同时被挪用。所以这个论述必须可以被持续的质疑，以免它轻易的反转成为或者带动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关系，这个新的权力关系在相对位置上可能改变了，但是其主要特征仍然是一样的：从前被骚扰的，现在变成了加害者，而有人在骚扰别人。这个事实简直一点都没变！我觉得性骚扰论述的公平性（或是恶毒性）端视创造此论述者对情欲的主要态度：这些制定性骚扰政策的人的「道德范围」之内一定要容许不同的情欲感觉和表达存在，而且只要这些情欲感觉和表达存在不是强制的，就应该不被视为有问题。还有，这个政策也应该包含足够的保护措施，以防范不同的性态与性倾向被不平等的对待。由于在当下的菲律宾文化中，阴柔男性或 *bakla* 早就被同性恋化，成了被妖魔化的范畴，我们因此也需要制定一定的机制来保护这些特殊的人，不要让他们承受作为性少数而很容易遭受到的虐待及不公平待遇。

还有，骚扰的「事实」应该由交互主体来建立，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一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过度高估「受害者」的观点而排除或损伤「加害者」的观点。不可否认的，这可能是个很难执行的步骤，但是这却是正义的理想以及实现正义的过程最能展现它们特色的时刻。最后，我相信学院中还有其他人或团体，他们或许没有像我这样强的被迫害恐惧，但是他们也关心这个议题而且有不同的意见。整个菲律宾大学社群在此关

键时刻最该谨记在心的就是，性骚扰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争论，而且这些讨论不能只局限于一个部门，而应该在学校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都进行，毕竟，这些部门的健康和「生活」，是我们应该集体努力保障的。

例如，菲律宾大学可以提出有关阶层高下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各式各样的骚扰形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性骚扰独有的重要性？或者，就像我曾经在前几段里提出的观点：为何事先预设性骚扰的发生一定是老师对学生，或是男性对女性？

将性骚扰置于其他形式的骚扰之上，就是象征性的把情欲放在中心位置，而如同我早就提过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表明情欲恐惧（也就是官方的、保守的、而且最终是异性恋性歧视）的性态度。另一方面，这种对性骚扰的特权化所可能造成的效应，就把所有的事情——从言论和手势到外在的举止和衣着到教学实践本身！——都归咎为性恶意的表现。这意味着原来并非性化(sexualized)的连结关系——大部分是无法量化而且不见得实际执行的互动模式——都将被性化；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点批判能力的思考方式都很可以用本土心理学这个较为不至于性偏执的架构来解释这些互动。就这一点而言，那个很明显阴柔 *bakla* 的男教授发现自己成了最可能被谴责的镖靶，只因为他拥有一个不合规范、因此易于受迫害的欲望。

进一步说，我们周围似乎流行着一个无意识的假设：异性恋女教授不可能性骚扰别人，因为她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性。有关这方面的主流论述既然有此「盲点」，因此也没有人思考为什么化妆、撅嘴、或者眨睫毛——这些都和观看或其他活动一样只是一个动作而已——也可以说是一种「女对男」的调情（这就是骚扰，对吧？）

就像那些规划菲律宾大学特有的「性骚扰规则」的人可以想像女学生可能因为被男教授注视而感到不悦一样，我们也应该不难想像一个男学生会对他女老师的外貌表现出同样的关切。然而正因为后面这个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可想像，因此目前由校园中的主流女性主义带头制造的性骚扰论述，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仍然受限于某种拒绝或害怕承认

女性身体也有情欲的保守主义立场。虽说这个保守主义立场后面的理论基础好像是想要翻转「处女／妓女」的二元分野，然而，否认女性情欲，不但不不会摧毁、反而保存了这个二元分野。换句话说，使女人去性化，事实上正好维护了父权压迫机制的完整。

对西方和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者而言，拆解二元对立的有力方式之一就是正是对女性欲望的颂扬——透过一个积极正面的计画来肯定自体愉悦(autoeroticism)，让女性得以自己享受自己的身体。然而这计画也带来女人「特有的欲望」的鬼魂，很容易导致、也难以离开激进女性主义或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问题。因此，菲律宾大学中的主流女性主义论述在面对女性情欲保持欲盖弥彰的沈默之时，也显示自身是与女同性恋政治的基本原则对立的。

要解除「茂盛繁衍的情欲」以及「偏执的处处见到性」之间的两难，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将校园中的性骚扰议题，重新定位在一个较为宽广的学术骚扰脉络之内。毕竟，大学中还有其他形式的激怒或骚扰，而这些都还没开始被讨论。例如，菲律宾大学现在可以开始关注老师常常进行的一种学术独裁，也就是当学生无法对老师的提问给予「正确的」回答时，老师会用有伤害力的名词来称呼学生——这些名词根本不必是而且确实也通常不是幼稚的或有性意涵的。或者，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每当男（有时女）学生聚集在老师身边，或者以「不受欢迎的」谄媚奉承她时，我们都可以说男（女）学生有可能是在骚扰老师。

学生也可能压迫其他学生，特别对那些显然「不同的」学生以及那些属于可以被压迫的少数的学生：例如，从两年前刚开始成立以来，菲律宾大学的 Babaylan 团体就不时需要提高警觉，以反击所有来自兄弟会成员甚至学校内「一般人」的嘘声和侮辱。而且，虽然没有人提出男同性恋教授可能被男学生骚扰，但事实上这却时常发生：男子气概很强的男学生确实会因为想得到某些好处或好成绩，而利用文化所容许的剥削行为，来玩弄或嘲笑那些阴柔男生对阳刚异性恋男性的明显刻板迷恋。这些别种形式的虐待，在目前菲律宾大学性骚扰论争的流行辞汇中，大

部分都还无法被想像，这是因为那些开始提及并控制这个议题流向的人属于性的基本教义派，而且也因为很不幸地性骚扰的话题是透过 Bading Carlos 的变态叙事进入大众想像的。猎巫的行动看来已经开始进行了，从最近菲律宾大学列出「不适任」教职员的名字缩写清单已经上了全国阅读率最高的日报就可看到未来的趋势<sup>9</sup>。虽然我谴责那造成这种「名单」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或是菲律宾大学或其他地方的谣言堆里的那种歇斯底里趋势，然而我自己也同样感受到压抑和贬抑，因为我了解到，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的身分认同——或其他我认识的人和关心的人的身分——将来不会有一天也列名（不管多么零碎或才开始）在这份名单上。（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必须承认这种可能已经是事实。）

考量以上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同性恋老师在这个不名誉事件的废墟中显然是最容易被控诉性骚扰的，因为他只要做他自己，就已经具现了情欲的标记——尤其因为大家都知道阴柔和同性恋特质之间的对等，这个具现更是光彩夺目！只要是个同性恋者，他的身体就已经承载了欲望的各式各样阴影和质感，而这些欲望则溢出了性领域中可被接受的任何特性或阶层的表达模式的疆界。就这一点而言，目前虽然理所当然的聚焦于这所大学的异性恋阳刚男人身上，但是这种关注很可能

---

<sup>9</sup> T. J. O. Besa III, "Death Knell for Campus Caper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2 October 1994): 9.

很有意思的是，这张名单上的都是因着恶作剧而被称为「野兽」的菲律宾大学教授，然而在名单之后却登出了一个有关「太过」政治正确的警告，说明政治正确曾经在美国造成学生只要说出像「死同性恋」(fag)、「烂男(女)人」(bimbo)、「黑鬼」(nigger)这样的字眼，就成了被开除的对象。文章的作者因此认为，把菲律宾大学里被认为是性骚扰者的名字缩写登出来——伴随着非常清楚的描述——或许是非常应该的，但是太过强调政治正确或不准学生说这些仇恨名称则并不是很好，也不太「人性」。

我觉得整篇文章充满了偏见，并且彻底泄漏了作者的同性恋恐惧。由于他所列的名单中包括相当多被视为男同性恋的教授，而且第一个不该被政治正确者看得太严重的字眼恰好就是贬抑、反同性恋的绰号：「死同性恋」，看来作者的心态已经显露无疑。同样的，认为只要「来自菲律宾大学」就真的是性骚扰者，这样的观念在我看来是很有问题的——特别因为只要提交一份名单给报社，这些被点名的骚扰者事实上并没有经过任何适当的程序就已经被审判而且定罪了。

我只能为这些被私下处死的菲律宾大学教职员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己也开始越来越感到自身难保了。

根本无法和男同性恋老师所承受的迫害相比，因为，要是有一个同性恋老师很不幸的陷于「Carlos 文本」此刻所纠缠的歇斯底里中，那么这一个男同性恋老师所受的迫害就可能蔓延到校园中所有的同性恋老师身上。既然男同性恋者不是也从来不曾是大学学术圈的中心（至少在官方看来不是），他们所受的迫害和痛苦将很难得到媒体的同情，更不用说那些年资较深、地位崇高的教授了——不知怎么的，这些宿老们总是准备好了托词来回答他人好奇的问题，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任何事情隐藏在他们贤能的、敏锐的、睿智的双眼之后。

——本文大部分于 1994 年 10 月 16 日完成，后来发表于 1994 年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6 日的 *The Manila Chronicle*，第五页。经作者授权翻译。